

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

马克思主义文化学

总 序

中国学术向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鹄的，而于域外文化很少有强烈关怀。二千年中，虽有佛法东传，景教渐进等文化景观，然于士人眼中，皆非正统，不过方术技艺，无足为道。及至晚清，列强环伺，国难迭兴。西方文化藉近代工业和军事力量恣肆中国，至使务实的中国人正视一个发达的域外文化的存在，为因应事态之亟变，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留心于中西文化之异同。不过，盲目的文化优越感妨碍他们客观地对待研究对象；传统的直观式思维方法妨碍他们深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时代所提出的救亡主题及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忧患意识，妨碍他们平静地进行职业性研究。加之诸多其它因素，此时所谓文化比较研究，结论大体限于“东方尚道，西方尚艺”的框架。视西方文化为器的文化，物质的文明；视中国文化为道的文化，精神的文明。基于这种认识而提出的对策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和对策上的失误，则成为延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主要原因之一。

迨至五四时期，少数知识分子再创文化比较研究的局面，一则着手于传统文化的反省，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则步入西方文化之奥堂，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方策。东方文化之研究，一时蔚成风气。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学术发展，又一次被激烈的民族冲突和政治冲突打断。

近年来比较文化研究的兴起，实由当前的开放形势所引发，为中国现代化趋向所必然。对知识分子来说，重新关注于这个时代的课题，一方面出自对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化危机的记忆，一方面则来自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新的挑战的体认。但在研究过程中，似乎有一种主客观疏离的倾向。在主观上厌弃传统文化，

在客观上仍身负重担。犹如“一个不情愿的传统文化的挑夫。”
(a passive porter of a cultural tradition. J. Dollard, 1939)。

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来解决这个时代的课题。不是靠一两个依凭原始激情而大发宏论的文人，而是要靠一大批真正的知识分子，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在现代科学文化的高度上，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反省，然后才能有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

中国文化书院把这套丛书的编辑作为参与这一历史大业的一份努力，奉献给学界同仁。丛书亦是新中国比较文化研究的首演，它涉及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尽管其作者包括诸位文化研究的知名宿学，亦有近来成果丰繁的新秀。但要真正完成这一任务，还是相当艰难而繁重的，它的复杂性决定了此套丛书肯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作为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的教材，它更显得不够成熟。参加这个研究班的万余学员，都是完成了高等教育甚或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学者、教师、教授。相信这套教学丛书能在两年的教学研讨中由大家重新改写。

中外比较文化教学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七年一月

序 言

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关于文化的界说不下百种，不过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把文化看成是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一种是把文化等同于人类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习惯、规范、制度等。

一种是把文化看成是精神财富总和，就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精神文化。

一种是把文化看成是文学艺术，文化与文学艺术并用。

还有一种是把文化等同于教育，文化与教育并用。

此外，也有用文化来表示物质财富的。

这些对文化的认识，说明文化这一概念的含意是复杂的，我们研究文化学，讲文化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必须首先明确自己所讲的文化是哪一种含意。

马克思主义讲文化，在不同的情况下文化的含意也是不同的。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文中，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及其技师和专家的知识、经验和劳动是“我们需要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真正掌握旧社会所创造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文化”。^①这里列宁十分明确地把旧社会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认为只有通过学习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和技师的知识、经验和劳动，才能掌握旧社会所创造的文化，即掌握这个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一贯地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大生产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他这里强调旧社会所

^①《列宁全集》第17卷，第276页。

创造的文化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里的旧社会所创造的文化显然是资产阶级社会所创造的大生产。在同一文中，列宁接着指出，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给他们高薪，向他们学习统计和监督，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训练工人实现管理大型企业、组织大生产和最大规模的分配的唯一道路。前边强调向资产阶级专家技师学习以便真正掌握旧社会所创造的文化，这里强调向资产阶级专家和技师学习以使工人能够管理大型企业，组织大生产等。从这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列宁看来，旧社会所创造的文化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所创造的大生产。还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没有邮电和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①列宁认为邮电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范例。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邮电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组成的一种经济，但是它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指出了道路。这里把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同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以邮电为基础相提并论，这也表明，列宁所讲的资本主义文化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大生产。

恩格斯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中也曾在物质财富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他在谈论什列斯维希的两处沼泽上发掘的文物时说：“这里更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工业水平本身，精致的纺织物，美丽的平底鞋和制作精巧的套具，都说明这是一个比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高得很多的文化阶段；而尤其使我们惊讶不止的，是本地的金属制品。”^②

不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很多时候是把文化和物质生产分开的，在精神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而把物质生产看作是文化的物质基础。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

①《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9页。

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就把西方文化与资本主义的技术的发达和商品经济、交换的增长区别开来，把后者作为前者的物质基础。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列宁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 这里，把文化和知识等同，认为无产阶级以前的文化，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而无产阶级文化是这些知识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可见，这里所讲的文化就是指精神文化。列宁还以马克思主义为例说明这个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它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这里作为文化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和优秀文化遗产，都是精神文化。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是在精神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的。他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② 这里毛泽东同志强调文化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不包括经济和政治，与经济和政治不同，经济和政治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5—656页。

此外，马克思主义有时也把文化与教育或文学艺术等同使用，这里不赘述。

本书主要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对观念形态文化，即精神文化的看法，其中所说的文化，指精神文化。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实现四化的时代，这需要吸取和创立新文化，批判和清除旧文化。只有新文化才能推动改革、开放和四化，而旧文化则只能阻碍它。所以，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对它们作出科学的分析、评价和取舍、扬弃就十分重要。1980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文化热，人们热心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热心于研究外来文化，特别是欧美文化和东南亚文化。在文化研究中，人们提出不少新认识，取得不少成绩，但是也遇到不少问题，特别是方法论问题。在文化讨论中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分歧，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方法论不同。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分析或取舍不同，看法和结论也不同，例如，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料，方法论不同，结论也不同。有的人在其中看到了人道主义思想，有的人在其中看到了专制主义思想；有的人认为其主流是好的，应加以肯定和继承，有的人认为其主流是不好的，应加以否定和批判。研究文化必须研究方法论。没有正确的方法论，在文化研究中难以得出正确结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提供了科学地研究历史、科学地研究文化思想的正确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就是在承认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承认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从经济因素出发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为中介，再现精神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及其本质。研究文化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实践反复证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文化研究就会顺利发展，错误运用马克思主义就会给文化研究带来严重损害。

本书试图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观点作一个简要阐述。由于我

们的理论水平有限和时间很紧，虽然主观上想要抓住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主要东西准确地加以阐述，但实际上，很可能不少重要的内容没包括进去，对问题的阐述也难免有错误和不准确之处。本书可以看作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体会，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诚恳欢迎批评指正。

本书“文化的分类”部分是由林娅同志写的，其余部分是由赵常林同志所写。

为了配合本书的学习需要，我们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有关论述，并节选了部分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文化研究的成果，及部分有争议问题的各种代表性观点，汇集成《教学参考资料》附于本书之后。此资料由邸建新、赵常林、林娅同志编辑，最后由邸建新定稿，施德福同志对本书及资料进行审阅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感谢。

马克思主义文化学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的起源与性质	(1)
第一节 文化的起源	(1)
第二节 文化的社会基础	(7)
第三节 文化的自然基础	(14)
第四节 文化和人的肉体本性	(20)
第五节 文化的阶级性	(25)
第六节 文化的时代性	(34)
第七节 文化的民族性	(37)
第二章 文化的发展	(43)
第一节 文化的创造者	(43)
第二节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 国际环境	(47)
第三节 文化的发展与批判继承	(54)
第四节 文化的发展与学术自由	(68)
第五节 文化发展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	(77)
第六节 发展文化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	(85)
第三章 文化的分类、作用与评价	(92)
第一节 文化的分类	(92)
第二节 文化的作用	(118)
第三节 文化的考察和评价	(126)
第四节 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	(134)

第一章 文化的起源和性质

第一节 文化的起源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的创造物，没有人就谈不上文化，人的存在是文化产生的前提。观念形态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借助于意识和语言而存在，没有意识和语言也谈不上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人的意识和语言都是劳动创造的，从而也就揭示了人的精神文化的起源。

早在1845年——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第一部成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首先能够生活，解决吃穿住等问题，必须首先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本质在于人能够进行物质生产，正是物质生产使人与其他动物真正区别开来。也正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人才产生意识和语言。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语言也和意识一样，产生于物质交往的需要。

1876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思想。恩格斯认为，正是劳动使猿变成了人。劳动创造了人的手。在猿类中，手和脚的运用已经有了某种分工，猿的手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过程变得自由了，能够制造工具了，能够不断获得新的技巧了，于是变成了人的手。

在猿的手转变为人的手的同时，人也由爬行转为直立行走，

扩大了视野。随着手的发展，人的劳动和交往发展了，人们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人们产生了意识和交换思想、说话的需要，而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产生了语言。语言和劳动一起，促使猿脑转变为人脑，而脑髓的发展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起源的思想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文化起源于人们的物质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专门论述文化的起源过程。他们的文化起源于物质生产的思想，为研究文化的起源指出了方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中具体地探讨了抽象思想的起源、正义思想的起源、善的思想的起源、灵魂观念的起源和发展等。

拉法格认为，利用抽象概念象原因、实体、存在、数量、正义等等的能力，好像是人们先天就有的东西，抽象思想好像是在人的头脑里自发生长起来的。其实不然。以为抽象思想是在人的头脑里自发地生长起来，这同认为形式最完善的自行车或某种其它的机器是第一次就造成功一样糊涂。动物的本能是动物对它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条件适应的结果，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而是逐渐地发展起来的。抽象思想和动物的本能相似，不论在个别人身上也好，在整个人种里也好，都是逐渐地形成起来的，不是从来就有的。野蛮人就不懂得文明人的抽象概念，正如他们不懂得文明人的艺术和手工艺；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表示一般思想的用语便足以证明。要了解抽象思想怎样产生，就必须研究野蛮人和探究语言。

在语言中有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一个同样的字往往被用来既表示抽象思想，又表示具体事物。例如：

ta agatha (希腊文)，作财货、财富解；to agathon，作善解。

bona (拉丁文)，作财货、财产解；bonum，作善解。

goods (英文)，作商品、财货解；the good，作善解。

orthos (希腊文)，rectum (拉丁文)，derecho (西班牙文)，

right(英文)等等既表示位于直线上的东西，又表示法、正义。这就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普通人的语言同哲学家和法学家的语言能够结合在同一个物质的和观念的、具体的和抽象的词里面呢？是抽象的和观念的降低到物质的和具体的呢？或者相反。这个转化又是怎样完成的呢？

拉法格指出，词的意义相继发展的历史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是抽象的、观念的降低到物质的、具体的，而是物质的、具体的转化为观念的和抽象的。也就是说，表示直线的后来具有了正义的意义，表示人的具体本质的后来具有了财富和善的意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化？这要由原始人所处的社会条件来解释。原始人所处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具有质朴的平等精神。这种平等精神要求一切人都有同样的东西，一切生活用品或战利品都按照最大的平等在原始人之间进行分配，对于土地也是如此。在原始人学会以底乘高来测量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之前，因而也就是在他们学会比较平行四边形之前，每个家庭分得的土地块只有包括在等长的直线之内，他们才会感到满意。等长的直线内包含的地块满足了平等精神，不给纷争留下余地。因为这个原因，希腊文 *orthos* 一词先是表示置于直线上的东西，往后就引申来表示真实的、公平的和正义的东西。

同样，由于原始人的生活条件，经常不断地彼此斗争和同自然作斗争，使得力量和勇敢成了原始人的首要的和最必需的美德。在古代，要想成为财产的主人而没有军人的德行是不可能的。财产要求自己的占有者具有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品质，因为只有具备着这些品质的条件之下，才能获得财产和保住财产。当半开化的社会的成员分化为阶级的时候，贵族把勇敢和保卫祖国垄断了起来，英雄理想的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德性体现在物质财富里面，好像是物质财富把这种德行传给了它的所有者。物质财富的占有成了道德的美德存在的基础，在这种状况下，道德的品质同物质财富就自然地合逻辑地合在一个词里了。

拉法格还指出：在许多野蛮人中没有表现长、硬、圆、热的抽象概念。他们不说长的，而说像足；不说硬的，而说像石头；不说圆的，而说像月亮；不说热的，而说像太阳。也就是说，他们靠借喻来思想和说话。他们还不能把长的、硬的、圆的、热的这些属性同足、石头、月亮、太阳这样的事物分离开。但是，足的长短是不一样的，石头的硬度也有差异，月亮不常常是圆的，太阳夏天比冬天热。因此，当人们感到需要高度精确性时，他就承认一直供他使用的比较词的不够，于是他就想出长、硬、圆、热的类型，这些长、圆、硬、热的类型虽然来自真实事物，但是他们的属性由于受到脑力的蒸馏，已经不再同任何真实的物相符合了。而只表现为人脑里形成的观念。可见，在长期的脑力劳动之后，这些品质才从这些具体物分离出来、抽象出来，于是品质就转变为词，形成抽象思想。

拉法格的基本观点是：脑具有思维的机能，正如胃具有消化的机能一样，脑子只有靠观念才能思想，而观念则是它从自然环境和人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或人为环境所提供的材料中制造出来的。而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不仅改变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并且还制造出一个人造的或社会的环境。所以归根到底，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的产生和发展，是依赖于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研究原始文化时，也探讨了文化起源问题。

普列汉诺夫探讨了宇宙起源论，他指出原始神话很少谈到创造世界和创造人。例如，澳大利亚的戴耶里部落的一个神话就说：最初地球在彼列共达湖的中心裂开了，从裂缝中陆续出来各种动物：大乌鸦、鸸鹋、鸵鸟等。南非布西门人的一个古老神话说：人和动物是从北方某个地方的岩洞中或地面裂缝中出来的。新墨西哥拿瓦赫部落的印第安人认为，所有美洲人最初都住在山洞里，后来才打开洞口走了出来。随着他们出来的还有一些动物。

这些神话所以很少谈到创造世界和创造人，这是和创造这些神话的人们的生产和技术水平相一致的。蒙昧人的生产活动主要是采掘和攫取自然生成的东西：男人捕鱼和猎取动物，妇女则挖掘野生植物的根和块茎。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神话回答的是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而不是谁创造的。普列汉诺夫认为，至于上帝用土创造人的说法，不是一下子产生的，它以相当的技术状况、即人们所具有的制陶技术的知识为前提。

普列汉诺夫还探讨了万物有灵论的产生与生产技术条件的关系。他认为万物有灵论，产生于原始人的愚昧和无知。原始人不了解梦是怎么回事，不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为存在着灵魂，灵魂不死。他们往往进行类比判断。他们在观察自己的行动时就会看出，在行动之先，存在着与其相适应的希望，这些行动是由这些希望引起的。因此，他们以为自然现象也是由某种意志引起的，这些用自己的意志引起自然现象的存在物，是与人的灵魂相似的东西。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幻想呢，这是因为，人们的生产实践低下，作用于自然的范围狭小，因而对自然的了解太贫乏的结果。认识的贫乏就是幻想的基础。万物有灵论是在人的狩猎生活方式的影响下逐渐地发展并巩固起来的。在狩猎生活方式下，人还没有把自己与动物明显区别开来，他们的一切来自动物，当“蒙昧人”用类比法判断自然现象时，不仅把自然现象同自己比较，而且同整个动物界比较，认为动物也有灵魂，还扩大了万物有灵论观念的范围。

普列汉诺夫还探讨了原始人的动物图腾崇拜。普列汉诺夫认为，图腾崇拜的特点就是相信人们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把某一动物作为神来崇拜。例如，有的氏族把蛇作为自己的图腾，有的氏族把袋鼠作为自己的图腾，有的氏族则把老鸦作为自己的图腾。当一个氏族一分为二时，它的图腾也具有局部性质，狼氏族分为灰狼氏族和黄狼氏族。而当两个氏族合而为一时，就形成共同的图腾，它被想象成由两种不同

动物构成的动物。原始人之所以把动物作为图腾来崇拜，是因为他们靠狩猎生活，动物在原始人的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图腾崇拜的瓦解则是由于生产力提高，狩猎生活转变为农业劳动，图腾崇拜不适应农业劳动条件。

普列汉诺夫还探讨了原始人的舞蹈和游戏的产生。他指出原始人的舞蹈，例如澳洲的划桨舞，新西兰人的造船舞，都是生产过程的简单描述。原始狩猎民族的战争舞，是表达他们与生产紧密相连的感情和理想的艺术作品，而这些感情和理想是由他们的生活方式，最终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他认为，原始人的游戏也产生于劳动。劳动先于游戏，游戏主要是模仿战争和狩猎。而战争和狩猎主要是追求功利目的，是原始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游戏产生于再度体验狩猎和战争中所引起的快乐的冲动。

普列汉诺夫还研究了原始人的审美观念，他认为原始人的审美观念归根到底也是来源于原始人的劳动。他指出，猎人最初打死飞鸟，是为了吃它们的肉，鸟的羽毛、野兽的皮肤、脊骨、牙齿和脚爪等等是不能够吃的，但是这些部分可以作为他的力量、勇气或灵巧的证明和标记。因此，他开始以兽皮、兽爪和兽牙装饰自己，甚至把羽毛插在自己的嘴唇、耳朵或鼻孔的隔膜上，在插入羽毛的时候，除了想夸耀自己的勇武之外，一定还有另一个因素发生作用，那就是想表现自己有忍受肉体苦痛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当然是身兼战士的猎人的一个十分宝贵的品质。而当狩猎的胜利品开始以它的样子引起愉快的感觉、而与有意识地想到它所装饰的那个猎人的力量或灵巧完全无关的时候，它就成为审美快感的对象，于是它的颜色和形式也就具有巨大和独立的意义。普列汉诺夫强调正是原始人的劳动决定了他们的实用观点，决定了他们的使用价值观念与审美价值观念。原始人以实用观点看事物，往往先于审美观点看待事物，而事物的使用价值则先于审美价值成为原始人的对象。

拉法格关于思想起源的探讨和普列汉诺夫关于原始文化的研究

究具体地说明了文化的起源问题，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起源于劳动的思想。

第二节 文化的社会基础

文化不仅起源于生产劳动，而且以物质生产及其所造成的经济状况为社会基础，一切文化毫无例外。因为，文化的主体是人，从事物质生产，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是人的最基本的特征。人们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和精神生活过程。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应该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更精确的术语，表达了同一思想，他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意识形式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现有冲突中去解释。强调文化有其社会基础，认为文化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生产及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一个根本特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正是从物质及其所造成的经济状况出发去说明各种文化现象的。

最直接反映物质生产状况的是经济学。例如重商主义就是15世纪末到17世纪下半叶商业资本要求的反映。重农学派出现于18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世纪50—70年代，它反映了法国革命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和要求。亚当·斯密的学说，反映了英国产业革命前夕工场手工业发展的状况和要求，李嘉图的学说则是产业革命时期产业资本的意识形态。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古典经济学，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最初研究资本主义的是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

法律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①例如，商品生产中的具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它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赋予的。同样继承法也是从现存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随着法律的发展，立法日益复杂，产生了法学家和法学。虽然法学在其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关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把它们看成是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相反认为它们本身含有自己的根据，虽然法学家认为法权的发展只在于接近永恒的公平，其实，无论是法权关系还是作为它的标准的永恒的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的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道德也以经济状况为基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②。“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③。在原始社会，在某一时期，杀死没有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被认为是合乎道德的，这种道德观正是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险恶的生活条件的产物，它适合当时的情况，也只有放在当时的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134页。